

客观公正·言论自由·为民请命

——试论黄远生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及其实践

余 玉

摘 要：黄远生是中国新闻史上较早践行专业理念的名记者，其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主要表现在：首先，他在新闻工作中忠于事实，追求新闻的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其二，他积极倡导并坚守言论自由思想；其三，他明确提出了“为民请命”和“指斥权贵”的报刊责任。黄远生的“四能”思想和“远生通讯”，是他践行专业理念的自觉，这些专业理念和职业操守虽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对我国后来的新闻界带来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黄远生；专业理念；记者“四能”；“远生通讯”

作者简介：余玉，男，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5) 01-0059-06

黄远生是我国新闻职业化启程阶段的奠基人物，目前新闻界对黄远生研究成果比较丰硕。笔者通过梳理发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黄远生荣誉范畴和业务层面，荣誉范畴着墨于“民初三大记者”、“报界之奇才”和“通讯文体的开创者”等，业务层面主要在采访能力、记者“四能”、新闻通讯特色等方面。对黄远生新闻思想方面研究也有一些成果，但总体上还是聚焦于业务层面居多，较少有研究者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论及他的新闻思想，尤其对其言论自由思想研究就更为薄弱，以致目前研究成果显得趋同。

新闻专业理念是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应遵循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职业操守的总称，“指新闻媒介必须以服务大众为宗旨，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1]“它是由客观性理念、自由与责任的观念、服务公众的意识以及自律和他律组成的原则体系。”^[2]新闻专业主义思想虽然是舶来品，但在民国初年，我国新闻界对这些操作理念已有孕育，当然还是停留在感性层面，没有把它们上升到理性层面成为自觉遵守的专业理念。但有关新闻的真实、客观和言论自由及报刊的社会功能等专业理念内核，黄远生对此已有认知，在他所作的《少年中国之自白》、《本报之新生命》、《祝也坎诘也坎》、《忏悔录》、《平民之贵族 奴隶之平民》等文中形成了有关专业理念的萌芽思想，如报纸是“主持清议”的“文明机关”，“为民请命”的“公共舆论平台”，力求言论独立，记者要谨守“客观公正”、“超然不党”，记者要有“四能”素养等。虽然这些还不能说他已经把这些理念上升到理性层面而“有意”为之，但这些理念在其新闻实践中已有大量尝试，并对后来的新闻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尊重事实，客观公正

黄远生的新闻生涯仅约四年左右的光景，从1912年在北京创办并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到1915年12月在美国旧金山被人暗杀，期间编辑过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月刊，并担任上海《申报》、《时报》驻京特约记者，还常为《东方杂志》、《论衡》杂志、《东方日报》、《国民公报》和《亚细亚

日报》撰写稿件。虽然他的新闻生涯短暂,“却像彗星一样,一时显著于报界”,^[3]成为民国初年“三大名记者”。

从黄远生主办报刊的宗旨和他的众多新闻通讯作品内容来看,他一直都很看重并践行着新闻报道的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理念。他在主办《庸言》时写的《本报之新生命》中表述了这种办报方针:“夫理论之根据,在于事实”、“演绎的理论,决不如归纳的事实”,他尤其强调依据事实报道新闻,高度尊重新闻事实,所以他不主张空发议论,他认为“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而易为客观。……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其撷取其他之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他非常重视事实的本来面目,对新闻的客观性尤其看重,如果他下笔之时还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草率写作,妄作主张,他会感到不安,“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这种尊重事实的态度和“用事实说话”的采写理念正是所有新闻工作者应时时记起的。文章结尾还提到:“本报既为月刊,凡此一月之内外大事及潮流,吾人皆负有系统的记载,以供诸君参考及判断之责任者也。”^[4]黄远生不但重视报道的真实、客观,也特别注重新闻报道的全面、系统,以便读者了解事件的全貌。

黄远生对当时报坛上那种妄论是非、信口雌黄的风气非常痛恨。倘若新闻记者没有真实报道而是有意造假,他便会对那些所谓的“记者”嗤之以鼻,并严厉斥责:“若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倡议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5]他在主办《少年中国》周刊时也谈到:“脱离偏倚,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之元气。”^[6]强调持论公正,“正论公理”,不能脱离客观事实,主观臆断,绝不“逞臆悬谈”;他还在《忏悔录》中自省:“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即可陷其人于举国皆曰可杀之中。盖一人杜撰,万报誊写,社会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至于凭臆造论,吠影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7]告诫记者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切记新闻工作尊重事实,忠于事实,绝不能杜撰报道,凭空捏造,否则会祸害个人,败坏国家;他在《庸言》中《消极之乐观》一文,再次强调应真实报道新闻,“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乃最重写实及内照之精神,虽甚粗糙而无伤也。”可见他视“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理念为新闻报道信条。他认为,作为“社会公器”之媒体,在任何时候都应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应该让民众有平等发表意见的机会:“余念新闻记者之于新闻,当据所见闻以客观的公平的之态度出之,非敢有私于熊氏也。吾后此若能采得别种可以证凭之材料,即不利于熊氏者,余固将一一表而出之。”^[8](引者注——“熊氏”即国民时期曾任总理的熊希龄)黄远生就是这样将不同看法“一一表而出之”,坚守着公正、平衡的报道原则。

二、言论自由的追求和坚守

在黄远生早期人生轨迹中,就充满着对“自由”的渴望,时时闪耀着“自由”的光芒。“中学时代的黄远生就向往自由,厌恶专制,陶冶情操,健全体魄,是为了准备将来投入战斗的一种尝试和朦胧的追求。”^[9]黄远生的生活年代是清末民初,当时政局动荡,新旧思潮交汇,学生们热烈谈论的是革命、自由、民权等激动人心的话题,而黄远生是一个热烈追求自由、“脱离专制”、向往光明的青年,他对当时南洋公学学生罢课还特发电去祝贺:“南浔公学全体学生,恭贺南洋公学同学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1903年参加县试是亲人“苦劝”而去的,由于他憎恨这种维护封建秩序的科举制度,“罢学后,乃为家人所促迫,而陷于科举。”^[7]考中进士本是仕途发迹之时,针对河南“知县即用”的官衔坚辞不就。到日本留学时,“他就是康梁体系所属的政闻社外围的活跃分子,但却始终不肯参加政闻社组织,认为无党无派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之身、自由之魂。”^[10]他于1909年从日本归国,短暂任职清朝邮传部后毅然弃官投身报界,渴望把他钟情的自由主义理念付诸实践。可见,黄远生的内心深处一直是渴望自由、向往自由的,这为后来在报界秉持言论自由思想做了铺垫,孕育了种子。

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是在民国之后,在约四年的新闻生涯中,言论自由思想是贯穿他的新闻事业

的一条主线。民初伊始，随着民主热潮的高涨和言论出版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中国报界一时拥有了言论自由环境，报界得到了短暂繁荣的机会。但好景不长，综计1912年到1916年6月袁世凯当权期间，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被传讯，9家被军警捣毁；新闻记者有60人被捕，24人被杀，形成了民国后连续数年的新闻出版事业的低潮。^[11]此时言论界一片死寂，本来就听不到人民声音的新闻界，这时更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境地，在这般黑暗年代从事新闻工作的黄远生，始终呼吁言论自由，这在当时具有反封建专制的积极意义。可以说，黄远生是在继维新派和革命派言论自由思想之后，中国卢梭式的自由主义者。“黄远生作为一座丰碑的高度，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哪个自由主义者所超越。”^{[10](215)}

黄远生一生主办了两个重要刊物，都能感受到他热衷言论自由思想。在初涉言论界主办《少年中国》周刊时，他对言论自由抱有极大的热情和信心。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写到报刊的出版动机，阐明了他的言论自由主张：“吾少年中国之发行，亦仅积鲠在喉，不能不吐，幸以三人积鲠相同，乃遂相共二倾吐之。用力之俭，无藉于外援，发机之微，无用其考虑。”^{[6](10)}（引者注——“三人”指他自己和一起创办《少年中国》周刊的张君勱、蓝公武）他在文中疾呼：“夫人生之最惨，莫惨于良心之所不欲言者，因而他故而不能言，良心之所急于倾吐者，而乃不能尽言，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的确，黄远生的好友林志钧在编撰《远生遗著》的序言中也谈到：“他的文字，就像他的人，活泼泼的，天真烂漫的，不加修饰，有什么说什么的。”黄远生正是以他的自由笔触为文的。他对当时报界没有言论自由的死寂状态非常不满，“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见国民真正之精神，今吾国言论界之可悲也”。黄远生还进而从“立国”的高度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主持理论或政治者，则多崇人心之自由，迷信物质者，则等人类若机械，凡一过之存，必以自由之人类立国，决不能以机械之人类立国。”

黄远生新闻生涯的后一阶段主办的《庸言》同样秉持言论自由思想，在《本报之新生命》中提到：“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4]显然，黄远生主办《庸言》欢迎大家表达不同观点，自由发表言论，他都给予尊重。民国以后，“待到袁世凯上台，封压报纸，抓捕报人，几成家常便饭，所谓的‘自由’云云，早已是面目全非，名存实亡。”^[12]报纸报人所受到的摧残和迫害，比清朝末年还要严重，黄远生大胆责问：“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肆其无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7]在袁世凯专制淫威下的舆论界，这样的责难和对言论自由的追求需要相当的勇气。为了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和利用言论界，袁世凯不仅援用前清旧规，还出台新规，限制言论自由，禁锢报业。“盖自报纸条例公布，检查邮电，阅看大样，拘捕记者，有炙手可热之势也。”^[13]黄远生对当时言论界失去自由失望至极，便远避京城跨洋去美，免得受到来自袁世凯的纠缠。1915年9月以后，黄远生在《申报》上刊登了三则启事，鲜明地表达反对帝制的态度，并毅然辞去袁世凯系统报纸的聘约。^[14]他在摆脱禁锢之身后，给好友写信道：“宰平吾兄，去都已远，心襟开拓，自由之乐，不可言也。”^[15]可以看出，黄远生早就对自由充满了渴望，同时能体会到他在京城追求自由的压力和痛苦。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方其桎梏之初，犹若槛兽羈禽，腾跳奔突，必欲冲出藩篱，复其故所，归其自由。”从文字中也能体会到他的痛苦不可名状，痛感自己时常被旧势力所左右。不过，从字里行间，我们也能体会到他对自由的最终获得还是充满信心的。

三、“为民请命”的责任意识

民国以前，我国新闻界还一直是秉持维新改良派的办报思想，如严复的“去塞求通”、梁启超的“向导国民”等。民国初年以后，黄远生对这些新闻思想进行了“扬弃”，抛弃了维新派把民众看作是智识未开的愚民的精英意识，切实关乎民众疾苦，体现了“真平民”的报刊思想，对报刊功能和使命

又有了新的认识 and 提升,更加明确报刊的责任意识。“明达的记者,并不以社会上为人推崇而自夸自满,反而格外的谦恭,忠实的,公平的,努力的对他的职责负起责任”。^[16]黄远生就是民初这样一位“明达的记者”,把为民请命、指斥权贵、舆论机关视为报刊使命。

“为民请命”。黄远生于190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不想做官,为了谋生而接受了清政府邮传部外郎兼参议厅行走等职,他在《忏悔录》中写道:“吾于科举时代,绝无做官思想,至为留学生将毕业时,则谋生之念,与所谓爱者之念者交迫于中。”于是,黄远生有机会长期游走于官场,目睹当时中国政坛混乱,官僚明争暗斗,社会民不聊生,他短暂任职后就自弃功名,毅然选择了“为民请命”的新闻记者职业。如他所述:“革命既起,吾之官乃与满廷俱毕。嗣后即立意不做官、不做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7]

在黄远生短暂的新闻生涯中,从他主编的报刊和《远生遗著》收录的文章可知,他一直秉持着“为民请命”的报刊使命和责任。他认为:“今日中国无平民,其能自称平民,争权利争自由者,则贵族而已矣。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者,所谓真平民也,则奴隶而已矣。盖恣睢无道,残酷不仁,至于中国今日之平民政治为已极矣。”对一些以“平民”自居的权贵给予了辛辣的嘲讽,一针见血地揭穿他们是“争权利争自由”的“假平民”,而“真平民”是供租税以养国家的困苦无辜底层老百姓,他们“呻吟憔悴、困苦流连”,“口不能为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万贵族之奴隶狼藉而已。”他在文中还警告那些当权者:“呜呼!百万之贵族听之,吾闻多行不义必自毙。”^{[5](3-4)}黄远生对老百姓怀有深切同情,表达了他为老百姓奔走呼号的急迫心情,同时对权贵们的下场作了明确的回答。黄远生另有一文深刻揭示了下层平民的苦楚,“不平民者,则为圉为台,为隶为皂,束伏于层层势力之下,世间动物之最苦者也。”^[17]这里对普天下平民的生活困境的分析是力透纸背的,从心底里想通过报刊“为民请命”。相反,他对那些不揭露社会黑幕、不为人民请命的“报人”笔锋犀利地指出:“取大猾豪右之唾余而以为养而又游食四方,以社会耳目口舌美誉自赞的报人,比起那些手足胼胝、终日劳碌不得温饱的农夫,实在是刍狗之辈。”^[18]黄远生为当时民众采写了大量新闻通讯,痛斥权贵腐败,揭穿政坛黑幕,反映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在他的许多篇章中都能感受到“为民生社会请命”的新闻专业思想。

“指斥权贵”。黄远生充分利用报刊和手中之笔指斥上流社会,敢于将笔锋指向权贵和政府,包括各级官僚及政客要员,乃至专横跋扈的袁世凯,以行使监督政府之责。他对袁世凯毫不留情地批评道:“袁总统者能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力”,于是造成“今吾国内外各奋其私,各循其党,干法犯禁,为所欲为,欺弱凌寡,惟力是视,更从何处得见有国家之权力者?”他还用反讽的口吻指出:“中央与各省都督之间最文明矣,则日以文墨为戏,其下者则口舌斗殴而已矣,更其甚者则枪毙操没,惟意所欲。”把官场上的黑幕和肮脏暴露无遗,对于权贵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横行乡间、鱼肉百姓的丑恶行径辛辣地写道:“划分全国为若干势力范围,又划分全省为若干势力范围,其党魁则日日相隐于腹剑蜜舌之下,其徒侣则日日一血肉相搏,而攫食地方之余利。”^{17}文笔犀利,见解精辟,展现了当时政坛的腐败昏庸和老百姓民不聊生的困境。在黄远生所写的新闻通讯中,也有许多篇章是指斥权贵和政府的,如《官迷论》中讥刺“民国时代之内外国纷纷以争权夺利为诟病,争者何权?官权是也。夺者何利?官利是也。”《外交部之厨子》从“余厨子”的发红奥秘揭露官府的卑污与龌龊;《囍日日》嘲讽连勋章都不知如何佩戴的孙总长、汪教育总长和熊总理等一班腐败的政府要员,真是痛斥得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此外,黄远生对媒体功能认识深刻还表现在报刊是社会公共舆论机关,是百姓心声的表达渠道。在他短暂一生中主编过两个重要报刊,即《少年中国》周刊(1912年创办并主编)和《庸言》(1913年底担任编辑人),这也正处于其新闻实践的一头一尾,这两份刊物都视报刊为社会公共舆论机关,尤其是后期主编的《庸言》,更强调《庸言》是“公同论辩之机关”,绝不占据为“私物”,这说明他对报刊舆论机关思想认识比以前更为成熟。

四、专业主义理念的实践——“远生通讯”和记者“四能”

黄远生作为“民初三大记者”，才思横溢，文思敏捷，采访功夫让后人景仰，采写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新闻和通讯，新闻中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成为后人研究民国的重要史料。“黄远生的许多文章都是当时历史事实的忠实纪录，为历史学家所看重。解放前出版的《中国政治史》（李剑农编）、《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编），就有多处取材于黄之通讯。”^[19]

中国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称黄远生是“中国现代通讯的奠基人”，^{[11] (740)} 吴廷俊教授也认为：“黄远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新闻通讯写作而负有盛名的新闻记者，他是中国报纸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演变的开拓者。”^[20] 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来看，中国自王韬开启了“文人论证”的传统，维新派梁启超承继了这一传统，所以政论文章在民国之前一直占据了绝对优势。到了民国初年，“报界之奇才”的黄远生，开拓了新闻通讯文体，开创了新闻史上的新时代——通讯时代，为后来的新闻记者提供了文体示范。他的“远生通讯”在当时驰名中外，影响极其深远，甚至成为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在《远生遗著》中收录的文章，有四分之三是通讯，且内容广泛，事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人物上至总统、政坛要员，下至普通民众，包括流亡者、受灾饥民、妓女等。时人读了，可了解时局动态；后人读了，可得到历史纪录。

黄远生能游走于当时政坛的各色人等中，以高超的采访功力采写到别人所不能的内幕新闻，写作能力也超乎常人，他的许多通讯对政坛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刻画得栩栩如生。如《外交部之厨子》中写到：“外交部之厨，暴殄既多，酒肉皆臭，于是厨子乃畜大狗数十匹，……纵横道满，狺狺不绝。而大堂廊署之间，遂为群狗交合之地。故京人常常谓外交部为狗窖子。”黄远生用影射的手法把卖国以求一己安宁的民国外交部比作野合的母狗，把官场的腐败和龌龊刻画得入木三分。又如《囍字日记》多处写典礼的庄重肃穆，要统一穿大礼服、晚礼服，戴高帽子，一般客乘马车、骡车、洋车，侍从总统乘轿。进入太和殿又是庄严的仪式，写到总统宣读宣言仅用12个字“精神登砾，音吐甚朗，军服灿然”，把那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的神态写出来了，对人物情态描摹得活灵活现，既谴责了国难当头大摆排场之非，又对袁世凯政府靠借债度日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再如一则新闻日记《亡国人之苦痛》写道：“一日大雨，洋夫妇坐两洋车，令以一车载其所爱之狗。车覆狗头碎，洋夫妇扼车夫项乱鞭之，车夫死于鞭下，夫妇洋洋抱病狗而去。”这一细节描写如同现场目击记，使人身临其境，亡国人悲惨的命运通过寥寥几笔就勾画得幽隐毕达，其写作功底可见一斑。因此，他的好友林志钧也不得不为之叹服：“有时朋友尽管几个人在那里乱说话，他自己在旁边，随便提起笔就能做那些新闻上的论说或通信，集中长篇的文字，多半是这个时候一挥而就的。”^[21]

黄远生令人称羡的新闻采写能力，固然有他的天才般的采写本领，但这仅仅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黄远生作为一名记者，具有很高的综合采写素养，也即他提出的著名的“四能说”，即“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调查研究，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适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7] 他提醒记者采写新闻应脑、脚、耳、手等并用，多种器官运用自如才能成为一位高素养的新闻记者。其实这不仅仅是记者业务素质的要求，而且是黄远生自己多年采写实践的理性升华，他是这样做的，同时还告诫记者注意基本功训练，强调努力提高自身修养的重要性。正因为这样，当时记者的地位较以前也有很大提高，成为时人称羡的职业。“有所谓报者，文明机关之一也，为之言者之曰：报之发达，与文明之发达为比例，又有言曰：某事某物之发达，与文明之发达为比例，故远生者作报人之一，亦即文明人也，凡作报者，皆文明人也，凡作文明机关者，一切皆文明人也。”^{[18] (77)} 记者的地位从黄远生开始得到较大提升，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当时报界非常重视向外埠增派访员也是明证。

五、结 语

黄远生虽然没有像他之前的梁启超等人那样,把报刊功能高度概括为“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也没有像他之后的张继鸾那样,对《大公报》提出了较系统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但他所主办的《少年中国》周刊和《庸言》月刊,以及发表在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杂志》、《亚细亚报》等刊物的新闻作品中践行了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标志着他的专业理念已经形成,并影响了后来的报界和报人,像邵飘萍、史量才、邹韬奋、张季鸾等大批报人都不同程度地从这些理念中吸纳了营养,我国新闻职业化也就由此启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却成了“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9](53)}可惜这颗初升的“明星”刚刚照亮中国新闻业走向职业化之路,微弱的“火苗”还未来得及发出耀眼的光芒就被浓浓的“黑幕”所吞噬。

毋庸置疑,黄远生若不是1915年喋血美国旧金山,他通过身体力行来践行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将会在新闻界发挥更大潜能,带来更大影响。所以,他的好友林志钧异常痛惜地写道:“远庸是不幸的,就是回国早了几年,受了恶社会的种种影响,到了他明白的时候,刚要翻身来,就被人家把他结果了,使他永远没机会发挥他悔悟以后的活力。”^{[21](12)}黄席群(黄远生的长子)也曾预言:“我敢断言,倘若先父能活到今天,他那已经孕育着进步因素的思想,准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向前发展。”^[22]以黄远生在新闻实践中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追求和坚守,外加他庄严的“忏悔”和强烈的“自省”意识,心灵定会得到洗涤,“进步因素”将会随历史向前发展,因此,这种断言不无道理。

参考文献:

- [1] 李良荣. 新闻学概论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348.
- [2] 吴飞. 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5.
- [3] 胡太春.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7: 247.
- [4] 远生. 本报之新生命 [A]. 远生遗著(卷1)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04.
- [5] 黄远生. 平民之贵族 奴隶之平民 [A]. 远生遗著(卷1)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4.
- [6] 黄远生. 少年中国之自白 [A]. 远生遗著(卷1)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1.
- [7] 黄远生. 忏悔录 [N]. 东方杂志, 1915-11-10.
- [8] 远生. 两八厘公债案与熊前总理 [N]. 申报, 1914-07-20.
- [9] 张宗厚. 黄远生 [A]. 新闻界人物 [C].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3: 34.
- [10] 张育仁. 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197.
- [11]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716.
- [12] 黄旦. 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8).
- [13]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169.
- [14] 黄远生. 黄远庸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 [N]. 申报, 1915-09-06.
- [15] 黄远生. 与梁漱溟书 [A]. 远生遗著(卷4)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91.
- [16] 张洁. 新闻职业化的萌芽 [J]. 新闻大学, 2006(3).
- [17] 黄远生. 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力之别 [A]. 远生遗著(卷1)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5.
- [18] 黄远生. 祝之坎沮之坎 [A]. 远生遗著(卷1)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78.
- [19] 邦梁. 试论黄远生的新闻思想 [J]. 视听纵横, 2006(1).
- [20] 吴廷俊. 中国新闻史新修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141.
- [21] 林志钧. 远生遗著序 [A]. 远生遗著(卷1)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2.
- [22] 黄席群. 远生遗著新版序言 [A]. 远生遗著(卷1)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7.